

超越 左右激进主义

Beyond Left and right Radicalism

——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著

超越“左”的“文革”浪漫化与“右”的西方自由主义“革命”，
在渐进发展的共识中，通过不失时机的改革走向新的政治文明，
是解决中国转型困境的根本出路。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萧功秦○著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Beyond Left and right Radicalism

——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 萧功秦
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308-10231-5

I. ①超… II. ①萧… III. ①社会发展—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D6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0644号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著

责任编辑 谢 焕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博远文化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655mm×965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300千

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231-5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自序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十年，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转型中期的深水区，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新的关键时期。近年来，当改革出现困境时，左的与右的激进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前者把“文革”浪漫化，要把中国拉回到改革前的平均主义时代去，后者主张实现一场西方化的自由主义“革命”。在当下中国知识界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左右之争中，激进左派与激进自由派都是相当强势的声音。它们都力求占据网络与民间话语的制高点，影响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历史选择。实际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价值与思维方式，始终深深扎根于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社会土壤与政治文化中。

近年来出现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对改革的新冲击与挑战，不但没有结束的迹象，而且还刚刚开始，社会上左右观念的对峙似乎更为突显。正因为如此，我深感到，坚持中道的理性主义，克服浮躁焦虑的心态，避免思维的极端化，在渐进发展的共识中，通过不失时机的改革走向新的政治文明，是解决中国转型困境的根本出路。温和、务实、理性，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也是我们经历过激进灾难的中国人，对百年先人、对我们未来子孙的责任所在。

本书是近年来在刊物上发表的访谈录、思想随笔与政论的结集。其中不少文章在国内媒体上发表后成为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的焦点。各篇文章环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超越左右之争，一方面，既反对激进的左的“文革”思潮回潮；另一方面，也反对简单化的西化自由主义，强

调观察与分析中国问题时，要特别重视我们的历史经验与运用常识理性，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与公民理性，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经由多元试错来寻找摆脱转型困局的最佳路径，实现向民主宪政体制软着陆。

本书第一篇文章是总论。该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上述观点。

第一辑各篇文章均从不同侧面对总论提出的观点加以论述与说明。在其中，我特别强调，通过维新模式而形成的强势国家往往具有很强的抗变化能力，它对旧思维的剥离能力难免比较弱，而且，当面临改革中的困境，由此引发左右激进主义对体制冲击挑战时，这个体制往往会进一步利用自己掌控的财富、经济与社会资源，来强化固有的大维稳思维，从而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我们近年来看到的情况，实际上是一方面国家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却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在这些文章中，我还提到中国可能出现的三种陷阱：第一种是自由民粹主义，第二种是“文革”民粹主义，第三种是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无论是哪一种，都将是改革大业的不幸。

我还提出，如果我们顺利改革，可以经由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极化效应”，进入“涓滴效应”的良性循环，让社会大众分享现代化的成果，最终克服两极分化，并进而经过民生建设与公民社会重建，形成民气顺畅的新局面，为民主宪政时代的到来奠定社会与经济基础。中国将经由改革者主政、经济转型与经济起飞、民生建设、公民社会、宪政民主的这五步逻辑，迎来中国民主繁荣新文明时代的到来。

第二辑是一组历史文章与谈话录。我力求从当代人所关注的新视角，来重新解读近代历史。在我看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用四句话来重新概括：一、自清中期以来，专制体制与保守文化导致了清末迟误的改革。二、迟误的改革又导致不成熟的辛亥革命。三、不成熟的革命进而导致中国走向碎片化。四、这种碎片化的分裂状态，恰恰是20世纪中国两种激进主义的起源，这两种激进思维又是使中国陷入更为深重的民

族危机与各种大灾难的最重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新世纪的中国人，通过历史反思来痛定思痛，从中国近代史与发展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反思出对当下有意义的东西。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不失时机的改革，克服焦虑心态与意识形态偏执，用常识理性与历史经验才能引导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

第三辑是一组文化谈话录。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如何在转型时代安身立命。其中涉及许多对当下人文问题的思考，希望能得到读者的共鸣。

有一位读者朋友，也是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读过我的《历史的眼睛》以后，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我讨论中间道路的困难与他内心的矛盾：

中国的路怎么走？中国人民的路怎么走？西式自由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缺少自由主义的基础和条件；新左派的路也难行得通，我们都经历了极左的灾难，我们知道它的后果。以后的人们再也不会同意我们的社会走这条回头路的。正因为如此，我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没指望的，中国的前途就只能是顺其自然了。这样的思考使我的思想非常悲观，内心世界正如您所描述的文化地狱感一样黑暗。但是我在读您的书的时候，为您的乐观和激扬的精神所感动，精神不由得激动起来：国家“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地往前走，改革终究是有希望的。

但是我又要说，每次读罢了您的书，当我合上书进行思考的时候，我的心却又淹没在无边的黑暗中，充满了悲哀和忧伤。

您引了一段赫尔岑的话：“我们正处在既来自过去，又达不到将来的中间环节，我们既看不到黄昏的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来的人啊，你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理解我们。”那么再过三十年，当你我行将就木的时候，还看不到黄昏的晚霞，看不到黎明的微曦，你将作何感想？我这里并不是对您的“新保守主义”的批评，而是吐露着我内心的

悲情，请您理解。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但我们还是要选择其中的一条。从现状出发，我只能选择新保守主义，因为它让人民少付出一些代价，还能在心中略存一点希望。尽管这希望如同遥远的天际还没有出现的亮色，但我们知道，天总是要亮的。

我在给这位朋友的回信中写道：

谢谢你的来信，你的书曾经鼓励着我与我的朋友怀着沉重的责任反思我们民族走过的路，并怀着同样的责任感去面对未来。你的信也使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同情的心灵如何在严肃地思考中国当下的命运。

也许文学家容易不自觉地成为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往往用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标准来衡量现实，这样做也有好处：可以为人类争取更理想的社会提供参照点，然而，这也会带来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现实总会使人觉得很糟。其实，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另一种角度，那就是历史的角度，历史总是不完美的，用墨子刻的话来说，人类的现实生活是神魔混杂的。人们只是在尝试与错误中不断向更为理想的方向演进蜕变的。这就是生活的本质，是人生的精义。

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时代虽然不理想，但相对于毛泽东时代而言，确实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它给中国人以更多的自由选择，激活了国人为争取自身利益而竞争的活力，国人的生活水平比你在那些著名的作品中考察过的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历史人物做成我们希望的每一件事，旧的集权体制，从理想的标准固然不理想，但作为一个“碗”，用来盛新东西，也确实比没有碗，而单用手来盛东西要有其优势，这也许就是新权威主义的要点所在吧。

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也许对于近代以来历史中负面性的东西看得太多了，因此，只要看到现实生活中有一点进步，就会欣喜，我们历

史学者太容易满足，也许我们的批判意识会不如你们从事文学的，但这样也有好处，那就是心态比较平和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足于已经有的这一切。这种心态至少能使我们可以避免悲观，并从已经获得的进步中形成新的期望与动力。

每个历史时代只能完成我们人类的一部分理想，并带来新的矛盾与困境，于是这就成为下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人类就是这样前进的，谁要我们是人而不是天使呢？人世间就是这样。也许这正是你所引用过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一格言的另一种解读吧。如果我们能这样看不完美的世界，并发现在这种不完美中自己生存的意义，那么，我想，我们不会“淹没在无边的黑暗中，充满了悲哀和忧伤”。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幸福就在于在不完美与完美的紧张中，去发现人生的意义。

在这里，我想通过引用这段通信，来向读者表露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现在再读他的信，我觉得他的信中有一点相当质朴而敏锐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担忧切中了中道理性主义的要害：一个在常识与理性上谁都觉得很好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成为人们的选择，更不意味着它就是历史的选择。这无疑是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一点。说句大白话，这就是中间道路的软肋。对此，我们寄希望于常识理性力量在社会更广泛地扩展，寄希望于鲁迅的哲学：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正因为如此，这本小书也是为了在社会上传递中道理性的声音，作出一份自己的绵薄努力。

我对中道理性主义之所以乐观并怀有信心，还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去意识形态思维”的时代。三十年来，常理思维，或说常识理性，已经通过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为起点的“去教条思维化”，而扎根于我们当中，也肯定扎根于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官员、企业家、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们的心灵中，他们是中道理性主义最坚实的社会基

础。如果读者诸君在读了这本书后，同意我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都可以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自勉：“德不孤，必有邻。”

转型时代的中国问题确实很多，我们每天生活在转型困境造成的种种压力之中，生活在源源不断进入你的电子信箱的、令人愤懑的信息流之中，生活在期待、失望、希望与焦虑之中。然而，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富有趣味的生活，何尝不是产生新思想的精神气氛？

如果说，丰富的问题意识是人们活着的意义资源，那么，三十年来，既然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期盼、太多的紧张，我们面临着太多的要用学理资源去思考的问题，我们渴望有太多的东西要突破，我们在生活中常感到沉重、焦虑、压抑，但却仍然充满憧憬，以及不确定性带来的生活丰富感，那么，我们人生意义的资源使我们的生活平添了更丰富的色彩。

提笔到此，使我想到了位于某一发达国家的朋友。他来信说，他总觉得他生活的那个国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很乏味的地方。“因为没有什么能引发争议的大议题，这个地方既没有理想，也没有可能危及国家制度的社会矛盾。很多时候感觉历史是静止的。虽然对老百姓来说，过日子是最好不过了。”他还自我解嘲地说，他们那里的生活已经“退化”到乏味的地步，并且又乏味到了需要“进口革命家”这条“鲶鱼”来改变他们的生活了。他最后写道：“身在中国，做知识分子，做学问，有时候想想，也挺幸运的，你不会太闲。”

我们谁都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你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时代注定是一个使你的人生意义十分丰富的时代，是一个鲜活的充满色彩的改革时代，但决不应该是个革命的时代。

萧功秦于上海寓所

2012年4月20日

总 论

为什么要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

只有在社会比较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主张理性、温和的中道主义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共识的基础，如果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大众的焦虑感与挫折感加深，左右激进主义远比中道理性主义对大众更具吸引力，此时激进主义者就会取得话语制高点而如鱼得水，左派与右派的激进主义总是在这种拉锯中把社会引向分裂，历史给予我们民族的宝贵时机也会悄悄流失。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故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

克服本书后面要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权威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最后，本书提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的设想，作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路线草图。我期待的是，中国正处于新的改革的前夕。

第一节 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一 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 21 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 1992 年到 2003 年，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逐渐走向边缘化，不再具有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左派意识形态官僚曾经在中国政治中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逐渐失势，并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所谓的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极左派”人士在活动，他们把改革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做“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 1992 年到 2003 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的目标，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

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历史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上世纪80年代政治参与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具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的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可概括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权威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造成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贫富分化、国富民穷、社会不公等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第一种激进主义：极左“文革”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

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极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之分，前者以部分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做“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不久前，笔者在重庆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几个坐在前排的参会者跳出来公然指责笔者：“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湖南、贵州远道赶来的民间左派人士。这些“文革”左派的浪漫主义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当然，会议上这一小小风波并不能代表重庆社会的大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说明激进的“文革”左派确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文革”左派在“乌有之乡”网上发文，公然把打倒“四人帮”说成是一场“硬性政变”，把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称之为“软性政变”，把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称之为“汉奸卖国贼”，有一位极左派甚至在“乌有之乡”网上称，2009年是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到了2011年，就是“我们左派们的战略反攻阶段”。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教条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做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听之任

之，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趁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为护身符，在社会上公开举办“毛泽东学院”系列讲座，由于获得了“重庆唱红运动”而自然形成的“唱红”政治合法通行证，在聚会场合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经典红歌，由于这些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随着社会存在的各种不满情绪的上升，它在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动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

第二种激进主义，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重新活跃

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套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把铁路造好了，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

这种民主观念的误区就在于，完全不考虑西方民主体制与西方的经

济、社会、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多元民主体制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支持下，才能有效运行。中国在发展初期，完全不具备承载多元民主政体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移入的结果只能导致中国陷入严复当年所说的“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归”的脱序状态。

自2008年开始，由于自由派对政府处置的一些事件的不满与国际上对此类事件的关注，原先处于边缘状态的激进自由派开始重新活跃。近年来，国际上频繁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加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常态化，以及中国目前的改革停滞与社会矛盾积累，都进一步刺激了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近年来，右的激进主义也同样在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中重新抬头。

两种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在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左右两种激进主义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们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当下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与官僚主义，作出简捷明了的、通俗大众化的解释。激进左派把所有的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的消极现象，均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定，只有再一次发动“‘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

另一方面，右翼激进主义者则把这一切归因于西式的普选式的多党民主化没有到位。他们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吸引大众，形成左与右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虽然理论上似是而非，但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均可以方便地迎合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心理，取得话语至高点。相反，体制内的一些理论家却抱残守缺，在理论观念创新上无所作为，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提不出鲜活的、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来看，人们普遍缺乏方向感，企业家、中产阶级、部分官员中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移民潮原因很多，至少表明，社会上对前途迷茫悲观的情绪，正在各阶层中蔓延。

二 右与左的激进主义给 20 世纪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必须承认，两种激进主义都因为简单明了而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只有揭示历史上两种激进主义造成的巨大灾难的铁的事实，才能破解它们的谬误。可以说，中国自 20 世纪初以来的近现代史，就是左右激进主义造成此起彼伏的拉锯式灾难的历史。

清王朝崩溃以后，辛亥革命志士们建立起西式的多元议会政治，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缺乏适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支持，难以起到有效整合社会的作用，从此无穷的党争与走马灯式的内阁危机层出不穷。1916 年，袁世凯死后，全面搬用发达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临时约法”再次恢复，这就再次回到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由此形成的府院之争进一步引发了激烈的党争与张勋复辟，并进而导致北洋军阀混战，此后中国陷入了五代十国式的碎片化状态。从宏观上看，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是 20 世纪初期碎片化时期大灾难的开端，而这正是漫不经心的激进自由主义实验失败的恶果。

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造成的大分裂，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无法支持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政治体制，失败原因可以从制度与文化的无法整合这一角度来分析。

事实上，简单地移植西方多元民主体制来实现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的历史选择，从来没有成功过。苏俄政治休克疗法后建立的民主体制，造成了国家碎片化，由于苏俄国家财税体制完全瓦解，国家养不起军队，军队只有靠卖武器养活自己。接下来是国家强力部门也由于没有生计来源，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谋利，不得不与黑社会相勾结，黑社会势力如瘟疫般地大肆扩张，造成整个社会的全面黑社会化。雪上加霜的是，由于

多党民主体制缺乏一系列社会条件的支撑，造成社会对政府有效监督体制的缺位，议会制下的掌权者又得以有恃无恐地将国有资产变成自己手中的财富，变成大寡头，整个经济产值曾下滑到原苏联的百分之十以下，从一个超级大国降为二流国家。直到普京上台，利用强力机器对付金融寡头，把关系国家命脉的资源收为国有，以强人政治代替寡头政治，才开始出现新的转机。事实上，如果八十年代中国采取苏俄式的政治休克式的激进民主化变革，由于中国是一个处于比苏联更落后的发展阶段的、资源贫乏的农业大国，其灾难性后果将会更为严重。

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实行多党民主制在世界上造成的灾难，同样不胜枚举。南斯拉夫发生的对克罗地亚人的种族清洗；卢旺达作为少数民族的图西族中有 77% 的人，在 1994 年以后几年里，被多数族胡图族屠杀；菲律宾与印尼发生的对华人的暴乱，等等。这些都是相对贫困的多种族在民主的旗号下，被多数族人掌权的政府煽动起来向相对富裕的少数族施行“多数人暴政”的结果。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反专制强人的“茉莉花革命”所带来的苦难，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利比亚的部落之争再起，“茉莉花革命”刚结束不久，无政府主义乱局就来临，卡扎菲之死不到半年，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利比亚人希望重新回到强人时代。

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看到，左的激进主义造成的灾难，同样是有目共睹。左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 20 世纪右的即自由激进主义在中国失败后的因果报应。共产党革命力量通过集权的革命手段，克服了碎片化与无政府化在中国造成的灾难后果，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是中国走向新时代的开端。然而，“超阶段论”的左倾惯性思维在建国后进一步膨胀，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搞激进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的“穷过渡”。毛泽东本人在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集权体制下，也不再受任何社会监督与党内制度的约束，从此，左的乌托邦幻觉加上高度集权政治，使毛这个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也在这一体制下为所欲为